

傳統中國與現代星洲 ——新加坡建國後“新聲詩社”創作傾向研究

張園林

論文摘要

新加坡建國以來，舊體詩詞的寫作在“民族性”與“現代性”的雙重質疑下，漸漸被邊緣化，但事實上作為新加坡文學的一條暗線，舊體詩詞的寫作並非漂浮在國家與時代之外。新聲詩社於1957年創立於新加坡，歷經新加坡由殖民地至獨立建國的整個歷程，至今仍是新加坡至為重要的舊體詩詞社團。本文擬以新加坡建國後的新聲詩社創作為研究對象，從時間、地點、風物、時事等方面出發，分析這一詩社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南洋本土”間搖擺的創作傾向，藉此探討曾被視為中華文化代表的舊體詩詞，在試圖於南洋風土中靈根自植的過程中，所歷經的傳統與現代、中國性與本土化的反復拉鋸，並以此管窺在舊體詩詞領域新加坡國族認同的建構與危機。

關鍵詞：新聲詩社 舊體詩 新加坡 民族認同

張園林（Zhang Yuanlin），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研究興趣為晚清民國詞、詞學理論、海外詩學等。Email: zhangyuanlin1000@gmail.com

前言

本世紀以來，海外華人在所居地的寫作一直處於學界的聚焦，許多學者對“離散文學”或“華語語系文學”展開深刻的討論與反思，其對新加坡華語文學也具有相當的啟發性。無論是“離散”或“反離散”、“中國中心主義”或“去中國中心主義”，在著意強調或刻意剝離的背後，無法忽視的是海外文學在中國性問題上的關注與焦慮。近年來一些關於南洋文學的學術著作如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¹、朱崇科《“南洋”糾葛與本土中國性》²等，紛紛將視角焦聚在中國性的存在與消長，這種關注自然也延及新加坡舊體詩詞創作。

鑑於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導地位，新加坡或整個南洋的舊體詩詞創作顯然受到“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雙重質疑，長期被擋置在主流文學史敘事之外。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³一文分析，以康有為為代表的過客詩人旅居新馬一帶時的舊體詩作，雖具有相當程度的南洋色彩，但在二戰後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與試圖建立新國族文化的潮流中，卻因語言的民族性及中國色彩過濃而被認定為妨礙新國族形成的因素，繼而被忽視與邊緣化；正因這種新國族認同與舊體詩文體之間的矛盾，及“認同比文學更根本”的意識，而將前輩舊體詩詞中的“南洋”切割在新馬文學的發展史外，最終成為文學史的贅餘。朱崇科《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一書也認為，“在以‘現代’命名二十世紀的新馬白話華文文學時，‘現代’往往被捆綁在語言變革的標準上，……語言標準本不應成為是否現代的絕對判斷，而內容的現代性同樣至關重要”⁴，因而將邱菽園具有本土關懷的詩作為新馬文學本土意識的萌蘖。至於高嘉謙、趙穎、王列耀、蒙星宇等學者，也紛紛將視角投射到早期流寓星洲的詩人，審視他們舊體詩詞中身份與文化歸屬的問題。

然而，隨著馬來亞與新加坡相繼獨立，“南洋”已非康有為、邱菽園時代的南洋，此時在兩地仍堅持寫作的舊體詩人，在本地文學史中的處境自然更為尷尬，尤與急切建立本土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新生政權格格不入。事實上，在新加坡建國後，本地不乏出色的舊體詩人，編織著一條與新文學寫作平行卻被忽略

本文獲得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資助部份經費。

¹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12。

² 朱崇科：《“南洋”糾葛與本土中國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³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2008年第4期，頁1-24。

⁴ 朱崇科：《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4。

的暗線，絕非孤懸在新國族認同的時代主題之外，且同樣參與和組成當代新加坡華文文學多重面貌中的一環。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一文，以邱菽園、潘受、張濟川三位不同時期定居新加坡的舊體詩人為中心，通過他們對地方習俗、語言、物產、名勝四方面的書寫，焦聚於從流寓心態到新國家意識形成的過程，論證“新加坡建國後，定居本地的舊體詩人明顯表現出在文化與政治上的‘雙重屬性’，即既認同中華文化，又以新加坡人自居”，這種與本地新文學力求“去中國化”的不同傾向，何嘗不是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意識”的另一種體現。⁵這種對文體與認同關聯的反思，為新加坡當代舊體詩創作所展現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提供一種新的解讀方式。然而，三個不同時代的代表詩人，畢竟只能體現豐富南洋舊體詩創作的一隅，本文擬繼承前人研究成果，探討新加坡舊體詩詞社團“新聲詩社”在新加坡建國以來，其於中華屬性與本土意識之間搖擺的創作傾向。

新聲詩社草創於 1957 年的新加坡，歷經新加坡由殖民地而獨立建國的歷程，創社六十年，至今仍是當地至為重要的舊體詩詞社團，共有二百餘位詩人⁶參與創作活動，主要包括節慶雅集、社課及詩詞班等，致力詩學研究，發揚風雅，至今弦歌不絕。正式出版物包括《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⁷、《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⁸、《新聲詩社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⁹、《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¹⁰、《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¹¹、《寰球詩聲》第一至七輯¹²、《新聲雅韻》¹³等。作為一個在新加坡建國之後仍長期活躍的舊體詩團體，新聲詩社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首先，詩社開展社課、唱酬之類的活動，每月一次的頻率持續十餘年，所選題目正是反映詩社關注的焦點和趣味，同題異旨的創作也顯示不同詩人的不同立場。其次，詩社經歷了建國以來的諸項大事紀，人事更替，新舊社員唱和，更加凸顯詩人之間立場的連結與不同。

⁵ 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東方文化》2015年第1期，頁 73-108。

⁶ 據新聲詩社現有出版物統計，參與詩人共計兩百一十六人，其中部份為馬來西亞、香港等地的詩友，當地實際參與者約兩百人。

⁷ 新聲詩社：《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57。

⁸ 新聲詩社：《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58。

⁹ 新聲詩社：《新聲詩社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新加坡：新聲詩社，1962。

¹⁰ 新聲詩社：《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81。

¹¹ 新聲詩社：《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新加坡：新聲詩社，1989。

¹² 新聲詩社：《寰球詩聲（第一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92；《寰球詩聲（第二輯）》，1993；《寰球詩聲（第三輯）》，1995；《寰球詩聲（第四輯）》，1996；《寰球詩聲（第五輯）》，1997；《寰球詩聲（第六輯）》，1998；《寰球詩聲（第七輯）》，2001。

¹³ 《新聲雅韻（第一輯）》暫缺。新聲詩社：《新聲雅韻（第二輯）》，新加坡：新聲詩社，2007。

詩社雖以“新聲”為名，事實上卻始終存在著內容與題材的“新與舊”、情感傾向的“新與中”之兩重對立。在這樣綿延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楚窺見被視為中華文化載體的舊體詩詞，在試圖於南洋風土靈根自植的過程中，所歷經的傳統與現代、中國性與本土化的反復拉鋸。鑑於建國以來詩社的作品眾多，本文擬從“時間、地點、風物與事件”四個題材為切入點，分析詩人們在作品書寫中所展現的兩面性。

一、時間

在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看，群體的時間觀念背後，固有其相應的物質與社會組織基礎。¹⁴ 詩人對時間建制的選擇與理解，及其感受時間的方式，都與自身對時間建制背後社會文化的認同與歸屬息息相關。季節與節慶作為一種經常出現在詩歌中的時間制度，折射了不同詩人在中國性與本土化之間的不同取捨。

(一) 季節

季節是詩社的熱門選題，據《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所載，社課中吟詠的季節詩題即有：餞春、甲寅春日、春草、春日吟、春曉、傷春、春日野趣、夏日遺懷、消夏、秋興、秋思、新秋、江館吟秋等。所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對季節的興感吟詠即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¹⁵ 鑑於新加坡位於熱帶，常年炎熱，在氣候上沒有四季之分，除了炎夏，其他季節只能存在於詩人的回憶與想像之中，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書寫季節選題的熱忱。換而言之，他們對眼下並不能感受到的季節的書寫，哪怕不是對“故國”，也是對傳統的致敬。

這些作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首先最多的內容是對季節的回憶。如楊文昭《春來》即體現了南來詩人的一種典型情感。詩云：

春歸人渺我何堪，往事無痕未忍探。惆悵綠陰輕結子，淒迷舊夢已沉酣。留情空憶江妃佩，解渴分瓢吳女柑。臘盡歲新嗟落寞，依然書劍向東南。¹⁶

¹⁴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12。

¹⁵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47。

¹⁶ 楊文昭：《春來》，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85。

由“惆悵”、“留情”諸句來看，此詩應為懷念遠在故鄉的一位女子而作。其時詩人身在星洲，思女也已成家生子。詩人因季節而引發回憶，這個季節是故鄉所有而本地所無，這樣的回憶自然轉變為對故鄉人事的回憶。時間的概念與空間聯繫在一起，這樣的作品在新聲詩社諸作中非常普遍。

另一種季節書寫則是真實描繪四季景象。舊體詩主要是抒情文體，其對四季風光並非單純白描景物，作者往往身入其情其境。這樣的書寫對身處新加坡的詩人而言，不如說是想像。試看陳寶書《錢春》、吳威之《江館吟秋》二例，云：

滿徑鬪飛花，一簾翻落絮。錢春還問春，可有將愁去。¹⁷

南國西風起，秋江接遠天。老桐飄落葉，疏柳聽鳴蟬。別館黃花酒，
清波漁父船。棹歌驚白鷺，飛出暮江煙。¹⁸

陳寶書《錢春》是傳統的傷春之作，飛花、落絮的意象容易讓人聯想前人無數春逝傷時的作品；結尾問句化用辛棄疾“是它春帶愁來，春歸何處，怎不解，將愁帶去”句¹⁹，也是舊體詩常見的手法。此詩雖無新意，但讀者完全可以忘記作者是身在熱帶，本無飛花落絮，也就沒有引發傷時之感。吳威之《江館吟秋》開篇點明“南國”，但詩中的老桐、落葉、疏柳、鳴蟬、黃花、白鷺，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原意象，而非南國景物，故其“吟秋”場景也只能是存在於想像之中。

另與上述兩類“四季”詩不同，一些詩人對身處熱帶有著明顯的自覺，甚至對於那些“虛擬四季”之作表示不滿。如許夢豐《秋興》詩云：

金風日日度西樓，未改南中景物稠。千里白雲長是夏，四時紅葉不知秋。鳥鳴垂柳晴偏好，山映斜陽晚更幽。莫漫悲秋懷杜牧，濫詞贏得古人羞。²⁰

這首詩的焦點是將視角從傳統中國轉向新加坡本土，詩中點明節氣變化沒有給本土風光帶來影響，最後一聯更指悲秋是一種“濫詞”，明顯諷刺那些“無秋可悲”的本土詩人，但卻一味悲秋的習氣。作者發覺傳統與現實不相符合，轉而選擇書

¹⁷ 陳寶書：《錢春》，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8。

¹⁸ 吳威之：《江館吟秋》，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28。

¹⁹ [宋]辛棄疾撰、徐漢明校注：《祝英台近·晚春》，《辛棄疾全集校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頁324。

²⁰ 許夢豐：《秋興》，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64。

寫現實和本土的態度，反映了部份詩人自覺的南洋意識。

（二）節慶

中國傳統節日佔據了新聲詩社吟詠主題的一大部份，節日提醒詩人時間的流逝，也是詩人確認自我身份的一種途徑。詩人們對大小節慶如除夕、花朝、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均有吟詠，一些重要的雅集活動也安排在傳統節日舉行。這些節日即與傳統文化相關，在節日吟詠之時，詩人也格外容易想起故國故人。如謝夢齡“追思賦感”一詩，云：

恍然軋軋織機聲，二十年前夜讀情。懿訓耳中猶宛在，慈容夢裏尚如生。鄉園何日賦歸去，弟妹於今幸長成。追念春暉終未報，每臨佳節淚縱橫。²¹

謝夢齡生於 1921 年，祖籍廣東潮安，1946 年遷居新加坡。²² 新聲詩社社員中有不少從中國南來的詩人，即如謝夢齡般隻身遠赴海外，遠離故土親朋，此後又因政治因素而與親人長期分隔兩地。中國節慶往往和團圓、祭祖等家庭活動相關，這些節慶成為他們與故土之間的記憶連結，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每值節慶詩人們都是倍感傷懷之時，不由引發對親人、故國的懷念。謝夢齡此詩作於 1962 年，此時中國大陸已處於紅色政權統治下，詩人有家歸不得，這種“鄉園何日賦歸去”的情感，在當時的詩人群體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國傳統節日也有一些儀式化的習俗，如除夕祭祖、清明掃墓、重陽登高等，這些習俗往往容易使身在異國的詩人引發感傷。如方煥輝《清明》詩云：

清明節到雨初勻，鶯轉如簧草似茵。客裏幾人歸上塚，老來此日倍思親。踏青異地風猶在，乞火鄰居事已陳。最是暮春天氣好，莫教寂寞負佳辰。²³

方煥輝也是一位南來詩人，生於 1922 年，祖籍廣東澄海，1946 年遷居新加坡。²⁴ 這首《清明》詩中涉及大量的清明習俗，如上塚、踏青、乞火等，異國雖仍有踏

²¹ 謝夢齡：《壬寅中秋節前一日為先慈逝世廿周年忌辰是夜得夢醒後追思賦感》，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 71。

²² 謝夢齡其人生平，參見《寰球詩聲（第二輯）》，頁 93。

²³ 方煥輝：《清明》，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 101。

²⁴ 方煥輝其人生平，參見《寰球詩聲（第二輯）》，頁 86。

青之風，然而畢竟身在他鄉，無法祭掃祖墳，在人情上也沒有堪與乞火的佳鄰。在這樣的情況下，異國的清明節日便只是徒有其表了。

此外，新聲詩社中也逐漸出現一些描寫現代或本地節日的作品，如青年節、勞動節、開齋節、屠妖節等，這些節日已列為新加坡的法定假日。如李金泉《開齋節》、林家興《衛塞節感賦》二詩，云：

回民慶祝開齋節，聖哲箴規教義深。食足安知饑最苦，腸空始覺餓難禁。先從父母求憐恤，再向親朋表愛忱。盛備佳餚恭待客，優良傳統古延今。²⁵

寒士如何報佛恩？焚香靜坐早關門。鏡前斑鬢真無奈，夢裏繁華不足論。飲水當能知冷暖，看山亦可度晨昏。胸中常繫慈悲念，萬丈光輝祇樹園。²⁶

新加坡是多民族多信仰的國家，在公共假期的制定上，充份考慮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的傳統，兼顧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重要節日。這些在政治方面為民族融合與新國家意識所作的努力，潛移默化地影響新加坡當地的詩人。例如，開齋節是伊斯蘭教的重大節日，中國的回教徒也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然而漢族詩人卻很少將詩筆觸及這些少數民族的節日，但在新加坡，在政府一視同仁的強化下，詩人們開始接受並歌詠這些他族的傳統。又如衛塞節，是南亞、東南亞佛教徒慶祝佛祖誕辰的節日，其與中國本土的“佛誕日”並非同日，而詩人對衛塞節的歌詠則表示他們對新加坡本土節日的接受。

雖然對於中國傳統佳節與新加坡公共節日的選題方面，詩社中產生一些認同上的差異，但這種對立情況並不明顯。其一、傳統節日是所有華人不分國籍與政治身份的共有節日，雖然一些詩人有懷鄉之作，但到後期也出現書寫新加坡的作品。其二、詩社雖有不少吟詠他族節日之作，但許多作者仍用傳統手法進行書寫，如林家興《衛塞節感賦》一詩，即與傳統意義的詠史詩一脈相承。然而，當節日選題涉及政治因素時，這種對立情況立即十分明顯，而“國慶”應是最具政治色彩的節日。蔡景榮《甲寅國慶》是較典型的一首，詩云：

憶從分道揚鑣日，正是新邦誕慶時。九載殫思為建國，百端循軌奠初基。壯觀列隊飄千幟，競舞群雄矯一獅。寄語官民休自滿，竿頭再進莫遲疑。²⁷

²⁵ 李金泉：《開齋節》，收入《寰球詩聲（創刊號）》，頁87。

²⁶ 林家興：《衛塞節感賦》，收入《寰球詩聲（第二輯）》，頁96。

²⁷ 蔡景榮：《甲寅國慶》，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108。

此詩從新加坡獨立開篇，敘述國家奠基之初不易，由此反襯國慶之重大意義與民眾的熱烈迴響，末以寄語官民、祝福國家作結；全詩起承轉合線索清晰，反映作者對新加坡建國充滿信心，應算作較常見的國慶書寫作品。

不過，仍有一些“國慶”為題的作品須要略作辨析。如王曉君以下一首：

縱觀楓葉紅如火，烘染碧雲天。承包致富，政施開放，活躍空前。欣
逢國慶，黃炎骨肉，兩岸情牽。合當歸矣，振興華夏，共樂團圓。²⁸

這首詞所寫的國慶，正值楓葉如火之際，又及改革開放、承包致富等語，顯然是吟詠中國國慶而非新加坡國慶。王曉君生平不詳，然從“合當歸矣”推測，應是長居新加坡的詩人——作者從1989年出版的《新聲詩社詩詞選集》即參與詩社活動，後來出版的《寰球詩聲》也將其列為本地社員。不論其國籍或政治身份如何，可以想見在新聲詩社內部，社員的身份認同仍有一定的差異。

二、空間

新聲詩社不乏對地點、名勝與空間書寫之作，作者對其所涉足或想像的空間的體知，所處理的正是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認同與歸屬議題。

(一) 地點

地點是舊體詩的傳統選題，無論是名勝、地標或日常建築，既是詩歌寫作發生的場景，又是寫作的對象。新聲詩社的地點書寫，包括名勝和日常建築兩種取向，而名勝詩作佔據較大比重，尤受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大量詩人有機會回國遊覽，自《新聲詩社詩詞選集》(1989)中即出現大量紀遊詩。這些詩作的內容與傳統遊覽詩差別不大，主要關注所處名勝的歷史掌故和遊覽經歷，遊蹤包括北京、南京、揚州、武昌等。這些城市如同一種文化符號，詩人們不自覺地將自己與城市歷史相互連結，作品數量之多，遠超他們對新加坡名勝的書寫。

當然，作品數量多寡不能完全取代情感取向，詩人們對新加坡名勝也充滿歌詠的熱情。值得一提的是《新聲詩社百期社課》收錄的“星洲十二景”詩，詩人們用傳統方式為新加坡十二處名勝命名，如《晴空飛車》(電纜車)、《碧浪淘沙》

²⁸ 王曉君：《人月圓・國慶抒懷》，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41。

(聖淘沙)、《遊麟煥彩》(星和園)、《飛塔流丹》(裕華園)、《四時春色》(植物園)等,²⁹這些名勝既有傳統園林和自然風光，也有電纜車、組屋等新加坡生活場景。詩社後期還出現一些追懷新加坡地景之作，如翁文泰的“牛車水”、“新加坡河”系列，³⁰顯示詩人對建立本土地景傳統的自覺意識。

(二) 懷鄉與還鄉

除了中國名勝或新加坡景物的題材獵奇，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在詩人書寫這些題材背後的立場與歸屬感，而懷鄉與還鄉無疑成了集中體現詩人複雜情感的陣地。此時詩人提及的地點、選用的詞語，就顯得至關重要。譬如詩人稱何處為鄉？何處為歸？這些都是暗喻詩人身份歸屬的密碼。如黃春疇《懷鄉》³¹詩云：

一別鄉關數十年，親情景物常夢牽。久留南島蒼涼客，北返心思老未遷。

詩人稱其居住數十年之地為“南島”，自稱為“客”，回鄉稱“返”，末句直接點明返鄉之思，數十年未曾改變。這種具有明顯傾向性的詞語，包括代指新加坡的“天涯”，如蔡承堅《午夜》“天涯浪跡滯他鄉”³²，林雲峰《錢歲（其一）》“寄跡天涯驚臘盡”³³，楊文昭《清明》“思親一掬天涯淚”³⁴。客觀上的地理位置沒有所謂的邊際與中心，但作者既稱新加坡為邊際天涯，自然是將中國置於心理位置的中心。

然而，在一些懷鄉詩作中，詩人則將自身與故土劃開了不可逾越的距離。如葉秋濤《懷鄉》云：

別緒行蹤憶最真，年華閃冉幾風塵。浮光掠影滄桑後，組屋環居聚落
新。月皎盈窗秋正半，燈明隔海夢猶親。何時舊土重遊覽，我已南邦老籍
民。³⁵

²⁹ “星洲十二景”包括：晴空飛車（電纜車）、碧浪淘沙（聖淘沙）、遊麟煥彩（星和園）、飛塔流丹（裕華園）、四時春色（植物園）、半夜濤聲（東海岸公園）、葩山望海（花葩山）、盤臺臨風（裕廊山頂酒店）、天羅禽園（飛禽公園）、原野獸牢（動物園）、漁歌唱晚（海島）、屋陣朝曦（組屋）。(《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 5)

³⁰ 翁文泰：《牛車水巴剎》、《牛車水廣場》、《舊日新加坡河——貨倉》、《舊日新加坡河——雀與鴿》、《舊日新加坡河——苦力》，收入《寰球詩聲（第七輯）》，頁 49-50。

³¹ 黃春疇：《懷鄉》，收入《寰球詩聲（第六輯）》，頁 120。

³² 蔡承堅：《午夜》，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 84。

³³ 林雲峰：《錢歲（其一）》，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 47。

³⁴ 楊文昭：《清明》，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 85。

³⁵ 葉秋濤：《懷鄉》，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 102。

此詩雖以懷鄉為題，但面對浮光掠影的往昔，詩人顯然認為“組屋環居聚落新”才是眼前的真實。隔海故鄉雖覺親近，詩人卻選用“遊覽”而非“回返”想像中的舊土場景，末句“南邦老籍民”更是自我界定了“回不去”的身份。

在書寫地點作品中，還鄉詩是特殊的一類。既云還鄉，在其背後則隱藏著兩個地點的前提，一個是長年旅居或已落籍的星洲，另一個是久未回返的故土，兩個地點的背後存在著到底何者為家的議題。謝夢齡《庚辰中秋回鄉感賦》云：

多難當年壯遠遊，於今落籍在星洲。齡高懷舊心尤重，氣爽思鄉情更稠。肥美尊鱸嘗不盡，留連絲竹樂忘憂。歸而復返如堂燕，千里睽違何足愁。³⁶

此詩作於 2000 年，與自稱“南邦老籍民”的葉秋濤不同，謝夢齡雖已落籍星洲多年，卻覺“老來懷舊心尤重”，只願身如堂燕，時時去而復返。堂燕雖戀舊家，但卻只能兩地來回，這些久寓南洋的詩人不論承認與否，事實上都已無法和新加坡割裂開。蔡映澄《送別金泉社長回國觀光》“敢道新邦非故國，猶稱去路是歸程”³⁷，正是兩地雙鄉意識的寫照，對新邦、故國的情感同樣深厚，但仍視故國之旅為歸程，這種複雜性恰是構成新聲詩社諸多還鄉詩的矛盾主題。

三、風物

新聲詩社詩人對於風物吟詠同樣出現矛盾的主題。詩社詩集中出現大量的傳統名花，如梅、蘭、竹、菊、松、蓮、桃花、李花、牡丹、水仙、石榴、海棠等，但是這些花卉大多數不適宜在熱帶生長，意即詩人們的吟詠並非源於日常生活的感發，更多的是對傳統意象的回應。詩人們尤其鍾愛梅花，而梅花乃於嚴寒冬季盛開，不可能在新加坡的自然環境中成長，但卻不減詩人的熱情吟詠。如梁建才《古梅》詩：“韻勝倩誰移海嶠，品高空自憶瑤臺。”³⁸ 詩中“瑤臺”指梅花盛開之所，而“海嶠”無花可賞，詩人又無法將心愛的梅花移來“海嶠”，只能徒勞回憶。“海嶠”所指，不言而喻。

林柏麟對梅花情有獨鍾，連續寫了十四首梅花詩。試看《問梅》云：

³⁶ 謝夢齡：《庚辰中秋回鄉感賦》，收入《寰球詩聲（第七輯）》，頁 8。

³⁷ 蔡映澄：《送別金泉社長回國觀光》，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 60。

³⁸ 梁建才：《古梅》，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頁 77。

籬邊負手立黃昏，欲訊春情語複吞。獨抱素心誰是伴，曷生麗質不能言。幾時月下弄疏影，何處枝頭認細痕。豈為嶙峋風骨在，一生故未赴炎溫。³⁹

詩人讚賞梅花的素心和風骨，筆下的梅花有著詩人的心志寄託，詩以“一生故未赴炎溫”作結，容易讓人聯想到詩人正處“炎溫”之地的現實。這些寄託雖非詩人的靈心獨造，但其背後豐厚的詩學傳統與意象積累，如梅花的高潔，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詩人吟詠花卉實際上也是在向傳統致敬。

南洋植物，如榴槤、椰子、胡姬花、紅毛丹、芒果、香蕉等，也是詩人吟詠的對象。詩人吟詠傳統名花多有羈絆，吟詠南洋植物則少有束縛，往往是即物詠物，強調南洋本地色彩。如謝夢齡《胡姬花》詩云：

出谷幽蘭別有春，臨風招展倍精神。移根遠徙馬來地，異種同源王者身。市肆求售成俗卉，豪門珍植傲芳鄰。看來似是護花使，真正護花得幾人？⁴⁰

胡姬花是新加坡國花，深受本地居民喜愛。謝夢齡此詩著重介紹胡姬花的南洋淵源，其與中國蘭花同脈，移根南洋後經過培育改良，而成花卉之王。這樣的經歷正與南來詩人的淵源暗合。此類作品頗多，如梁建才《椰樹》“炎洲氣候長相得，南島風光獨嘯吟”⁴¹，南洋的獨特風土培育了這些植物，枝葉峻茂，詩人難免流露與南島炎洲兩相得的心境了。

四、時事

新聲詩社詩人經常關注中國發生的國內時事與國際要聞，也直接在詩作中表達他們的立場與關注點。我們不妨參看詩社詩集中的這些題目，例如《中美領袖白宮峰會賦》、《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國長江三峽工程大截流》、⁴²《悼鄧小平先

³⁹ 林柏麟，《問梅》，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63。

⁴⁰ 謝夢齡：《胡姬花》，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77。

⁴¹ 梁建才：《椰樹》，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79。

⁴² 傅川：《中美領袖白宮峰會賦》；高永生：《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國長江三峽工程大截流》，收入《寰球詩聲（第六輯）》，頁145、149。

生》、《哀文革》、⁴³《外交醜聞》⁴⁴、《聞祖國人造衛星試射成功賦此志喜》⁴⁵等，選題涵括中國的各類事務；若非明言，難以想像這是出自新加坡詩人之手，而陳團錦更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詩人。

新聲詩社的“釣魚島事件”詩作更具上述寓意。釣魚島為中國、日本之間有爭議的國土，實與新加坡詩人沒有太多關聯，然其相關詩作的立場卻極其一致。試看羅育祥、張濟川二例，詩云：

北國歸來意未舒，盧溝舊憶恨如初。閱牆最痛爭難息，美日協謀奪釣魚。⁴⁶

孰拋血債動機心，以德市仁何所斟。負義今知倭欲動，張牙又見禍重臨。閱牆深痛朝多妄，攜手應知民不瘡。若有奴顏重賣國，炎黃世胄恨同深。⁴⁷

第一首詩以“國恨”為題，這種詞語具有非常明顯的身份傾向，詩中內容涉及盧溝橋事變與釣魚島爭端，此是中國之恨而非新加坡之恨，詩人卻將自己置於“中國人”的立場而抒恨。詩中又言“北國歸來”，從北國回到新加坡而曰“歸”，似乎又反映詩人對新加坡的認同，這種“雙重認同”與前述“兩地雙鄉意識”又有不同，值得玩味；詩人當時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層面，但這確是體現了許多新加坡詩人關注中國時事的共同心態。第二首詩則將這種情感表達得更為明確，作者從詩題到內容都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深感憤慨，詩中雖然沒有出現“國恨”等身份詞語，但作者認為這種憤慨應是無分國籍的全體炎黃子孫所共有。換而言之，羅育祥詩將自身對釣魚島事件的憤慨定義為國恨，是基於對“國”的認同與歸屬，而張濟川詩的憤慨則是來自對全球華人的認同；這種區分讓我們對新加坡舊體詩中的“中國時事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途徑——詩人對新加坡與中國的書寫和關注並非此即彼，“認同”可能會有多種層次與不同原因。

新聲詩社詩人也有對於本地時事的書寫。或因新加坡為小國，較少重大事件，詩人的關注點則偏於細節內容，例如陳薇《悼總統夫人林秀梅女士》是對本地名人的悼挽，⁴⁸王滄潮《申奧花絮》記錄了倫敦與巴黎在新加坡舉行申奧選舉的

⁴³ 謝夢齡：《悼鄧小平先生》；黃嘉儀：《哀文革》，收入《寰球詩聲（第七輯）》，頁9、21。

⁴⁴ 陳團錦：《外交醜聞》，收入《新聲雅韻（第二輯）》，頁169。

⁴⁵ 謝夢齡：《聞祖國人造衛星試射成功賦此志喜》，收入《新加坡新聲詩社詩詞選集》，頁73。

⁴⁶ 羅育祥：《國恨》，收入《寰球詩聲（第六輯）》，頁101。

⁴⁷ 張濟川：《憤吟倭奴又侵釣魚臺二律》，收入《寰球詩聲（第六輯）》，頁151。

⁴⁸ 陳薇：《悼總統夫人林秀梅女士》，收入《寰球詩聲（第七輯）》，頁45。

情況，《煙霧之擾感賦》描寫鄰國燒芭對新加坡產生的煙霧困擾，⁴⁹陳延任《競選側記二〇〇六》、《紅燈碼頭關閉側記》則是對日常生活中切身事件的觀察。⁵⁰因此，詩人對中國與新加坡時事的關注形成了對比，他們對新加坡的時事書寫更為具體切實，對中國時事往往屬於重大事件的評論和想像。

尾聲

綜上所論，新聲詩社同時保持對傳統中國與現代星洲的兩重關注，共同構成本地詩人創作的重要題材，而這種關注存在一定的規律，當詩人觀向中國時往往採取一種回望的姿態，觀向新加坡時則以目之所及的事件、時事或本土風情為著眼點。如此，地域概念也就成了時間概念，傳統中國與現代星洲的詩歌主題，交替出現在他們作品中的各個方面，持續延綿於數十年的社史，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隨著建國日久，遂由中華色彩到本土意識的轉變。雖然描摹本地風土的作品確實漸多，但截至最晚一部詩集也仍無法具有壓倒性優勢，這除了舊體詩詞的文體因素，也因新加坡的移民國家性質使然，至今仍不斷有新移民／新詩人加入，但更多是源於詩社本身的組織建構和所面臨的獨特處境。

新聲詩社創立至今已屆六十年，經歷新加坡建國以來的大小事件，其中最為切身相關的是，新加坡政府對華語和華文教育的態度轉變，而在一段長時間裏，華文被認為是新國族意識的障礙而遭壓制，舊體詩社團的發展空間也不充裕。新加坡是個小國，詩詞愛好者固然有限，加之華文教育衰落，老一輩詩人相繼辭世後，詩社漸有後繼乏人之感。詩社為此做了兩項努力：首先，新聲詩社與同安會館於1986年合辦詩詞研習班，培養本地新的詩詞寫作者，加速詩社的本土化；第二，在張濟川的主政時期，詩社加強與中國詩壇的唱和活動，增進對外交流，圖將詩社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體系中。

這兩項努力都產生一定的成效，如詩詞研習班培養的新詩人，漸漸成為新聲詩社的中堅力量，而與中國詩壇的交流也提升詩社的國際影響。但是，這兩項努力也為詩社帶來新的困境：首先，自《寰球詩聲》創刊（1992）以來，大量唱酬作品佔據新加坡詩壇的發表空間，至《寰球詩聲（第六輯）》時（1998），兩百頁的詩刊中只剩六十頁是詩社詩人的作品，其餘則是以中國詩人為主的作品，以及本地詩人與中國詩人的唱酬之作；其次，由於文化的割裂與華語資源的缺乏，研

⁴⁹ 王滄潮：《申奧花絮》、《煙霧之擾感賦》，收入《新洲雅韻（第二輯）》，頁127-128。

⁵⁰ 陳延任：《競選側記二〇〇六》、《紅燈碼頭關閉側記》，收入《新洲雅韻（第二輯）》，頁200、202。

習班培養的新詩人的詩藝遠不及詩社前輩，當這些新詩人成為詩社主力後，整個詩社已無力維持原有的詩學水平。

由於身處中國傳統文體與新加坡社會的夾縫中，詩社既缺乏傳承舊體詩學的土壤，也未能建構一個南洋獨有的詩學風格，詩社雖以“新聲”為名，然而始終存在著“新與舊”、“新與中”之間的力量博奕。社員背景複雜、政治風向多變、詩社後繼乏人，各種隱憂直接造成詩社無法提出明確的詩學綱領，也無法統一審美趣味，乃至政治立場、身份認同皆有很大的差異，導致詩社只能維繫為組織鬆散的團體，難於開宗立派。至2007年出版的《新聲雅韻（第二輯）》，甚至出現為數不少的新詩作品，動搖了“新聲詩社”作為舊體詩社的立社根基。此時詩社所展現的“中華屬性”與“本土意識”，已不僅僅是關於地域與身份認同的問題，更是一種文體在喪失充足的生存空間而向內向外尋求土壤的自我掙扎。

正如本文前言所述，舊體詩詞作為事實存在著的新加坡文學的一條暗線，並非漂浮於國家與時代之外，它深受這個國家時事與政策的影響，而以自己的方式給予回應。新聲詩社在“中華屬性”與“本土意識”之間的搖擺，既是新加坡詩人從流寓到定居過程中“國族認同”的展現，也是他們在華語文學全面衰落時迷茫自尋的縮影。自康有為、邱菽園時代傳繼在斯的一脈靈根，曾在南洋風土中結成奇花異果，卻在本地被移出土壤，又重新走上故土尋根的道路；這與其說是“新聲詩社”與新加坡舊體詩壇現今所面臨的困境，也毋寧說是整個中華文化在本地的一個尷尬縮影。